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五十七届会议**

2010年9月15日至28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11

听取民间社会的意见

贸发会议第二次公共研讨会报告**应对全球危机：新的发展道路****导言**

1. 2010年5月10日和11日，贸发会议与联合国非政府组织联络处和其他伙伴合作，在日内瓦举办了第二次公共研讨会。此次研讨会讨论了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的持久影响，以在需要提出新思路和新办法来应对全球危机的前提下，探索新的发展道路。

2. 全世界 300 多名代表，包括民间社会、私营部门、议会、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思想精英在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对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下面临的相互关联的最重要挑战展开讨论和辩论，并探讨和详述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发展道路。

一. 第一次全体会议***A. 开幕**

3.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主席让·费代尔先生(卢森堡)宣布研讨会开幕。他说，研讨会应当考虑到从金融、粮食、能源和气候危机中吸取的经验教训的前提下，提

* 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会期间，除了圆桌会议和全体会议外，还在民间社会组织、政府间组织和贸发会议的组织牵头下举行了八次分组会议。分组会议摘要见研讨会的网站。

出走上新发展道路的切实可行的想法。在确定这些道路和制定联合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全系统战略时，国家应在发展、融资和生产性能力建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后者对于创造就业机会和收入尤其重要。

4. 贸发会议秘书长素帕猜·巴尼巴滴先生在介绍性发言中说，在金融危机爆发一年后，全世界仍未拿出更具包容性的全球治理办法。他说，20 国集团并不代表全世界的人民和国家；一个真正包容的机制必须以 192 国集团为基础。素帕猜先生还说，联合国是合法代表国际社会愿望和需要的唯一机构，因此应当更多地参与对全球经济进行系统性改革的决定。他强调指出，国际金融体系未来的稳定性，以及这种体系可协助实现的繁荣，取决于能否将所有国家都纳入决策、监测和管理进程。

5. 他说，实现所有《千年发展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部分原因在于，这些目标侧重于为弥合临时差距供资，而不是推动实现长期可持续性所需的经济转变。此外，《千年发展目标》主要是从部门角度看待发展问题，而没有采取更加全面、综合或通盘的做法，这会产生不良结果。应将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努力纳入更广泛的经济发展战略，因为零散地侧重于《千年发展目标》中一些具体指标的办法是不可能持续的。

B. 圆桌会议

应对全球危机：新的发展道路

6. 开幕发言结束后，研讨会进入知名人士讨论主要专题的圆桌会议阶段。然后是互动式辩论和有重点的分组会议，对新发展道路的主要方面进行讨论。

7. 圆桌会议由世界贸易记者、路透社驻日内瓦首席记者 Jonathan Lynn 先生主持。专题发言人包括素帕猜·巴尼巴滴先生、联合国全球粮食安全危机高级别工作组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特别代表戴维·纳巴罗先生、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日内瓦)食物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奥利维尔·德舒特先生、南非议会主席 Makhotso Magdeline Sotyu 女士、孟加拉国政策对话中心主席 Rehman Sobhan 先生和南非援助行动国际组织国际政策与运动主任 Anne Jellema 女士。

8. 对于主持人的第一个问题，即危机最糟糕的时刻是否已经结束，或者说是否有发生新危机或债务危机的风险，与会者一致认为，虽然金融和统计数据上的一些复苏非常明显，但人的复苏并不明显，尽管在估计危机对贫困者的全面影响方面存在困难。银行的财务状况正在恢复；但是，虽然公共部门拯救了银行，它们却只考虑自身的需要，并没有对生产性部门进行投资。与会者说，投机行为仍然令人关切。另一方面，作为危机受害者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得到应对危机所需的援助，它们不得不学会主宰自己的命运。

9. 与会者指出，危机至少已给欧洲敲响警钟，这可能会便于实行严格的金融管制，因为危机证明市场是错的。有一名发言者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彻底关闭

金融市场，因为这些市场不再有助于创造财富。另一种替代办法，也是一位世界主要领导人已经提出的办法是，将具有社会功能的市场部分与纯由投机驱动的市场部分区分开来。

10. 应对持续危机的措施——这类措施应借鉴从危机中吸取的教训——应当考虑如何更好地利用金融市场，以及需要实行哪些系统性改革来降低金融市场今后的潜在风险。与会者还说，初级商品投机造成的粮食金融化和跨界土地交易的增加是导致发展中国家主要风险和脆弱性的驱动因素。遏制不受管制的金融交易，并提倡对外国经济体驱动的资本外逃收税，将有助于更好地调动国内资源，减少经济体中不受管制的冒险行为。

11. 有几个发言者还建议自动交流税务信息，由跨国公司按国家提出财务报告，并实行全球性的征税，例如碳税和金融交易税，因为这会促进全球经济的可持续性，并腾出资源对低收入国家进行生产性投资。还应考虑允许利用特别提款权以较低成本在金融市场上借款，并在不增加债务的情况下将其转换成硬通货，特别是对最不发达国家而言。此外，还需进行全球货币体系改革，以防止货币投机和贸易扭曲。最近发展中国家积累了大量的储备金，这表明国家之间缺乏信任，在处理全球不平衡问题时应对此加以处理。需要建立早期预警系统，但该系统应当装备“牙齿”，以使人们能够注意其警告。应对危机的措施还应包括实行更多的结构性改革，这些改革虽会毁掉一些就业机会，但会在其他地方创造其他就业机会，从而推动更可持续的增长。

12. 关于粮食危机，与会者普遍认为，这场危机尚未真正结束，因为，虽然去年的粮食总产量接近创纪录水平，但估计全世界仍有 10 亿人挨饿。粮食危机、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的萎缩让更多决策者看到了结构上的弱点，他们现在认识到，需要在基础设施、信息和投资方面采取更多行动，以促进农村发展，减少大规模失业，并减轻农户中的妇女负担。未来的粮食安全取决于小农户、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之间的伙伴关系，以及国家牵头的协调一致的行动，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发展中国家将成为加强所有人粮食安全的催化剂。

13. 发言者指出，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生产率持续较低的情况下，农业需要更多的资金和投资，这一现实妨碍了某些积极步骤，包括非洲出现的绿色举措。总的来说，要想重振农业，每年约需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投资 440 亿美元，这同国防开支相比，只是一笔很小的数额。另一方面，对农业政策的投资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有时会有矛盾。但提高产量与发展小规模的家庭经营农场未必冲突。农业投资应当多样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提供能够改善农民生活的公共货物。此外，还需处理“土地掠夺”问题，这一现象往往与农业投资有关。

14. 与会者建议对农业采取非线性办法。农业发展战略不应只包括生产更多粮食的目标，它们还应促进增加农村收入，减轻农村的贫困，并与其他生产部门建立联系。农业政策的重点应是近郊农业，以及保护城市地区免受农业价格震荡和粮食不安全的影响，例如建立能够满足当地需求的小型城市中心，并“分散”粮食生产，以增强城市地区抵御价格波动和供应变化的能力。

15. 关于相关的气候变化问题及其与同时发生的金融、粮食和能源危机之间的联系，有些与会者认为，全世界并没有把气候变化作为最大的挑战来应对，因此将会付出代价。气候变化缓解和适应方面的资金承诺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所需的数额。发言者指出，承付额——到 2012 年为 300 亿美元，到 2020 年为 1,000 亿美元——与发达国家在 16 个月的时间里为拯救本国银行和作为军事开支使用的 8 万亿美元相比微不足道。指导这一工作的唯一论坛应是联合国，而不是国际金融机构。

16. 《千年发展目标》中的目标 8 除其他外涉及官方发展援助、债务、技术转让和贸易，有些发言者指出，该目标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千年发展目标》也未充分谈及性别问题。新的发展道路应当涉及就业、减贫和以小农为目标的农业投资。与会者呼吁采取一种包容性的、更加以社会为基础的增长模式，一种寻求消除贫富之间知识鸿沟的增长模式。他们认为，民主是重建国家的关键，光靠增长是不够的。

17. 圆桌会议为接下来的全体会议作好了准备。

二. 第 2 次全体会议

重新思考全球经济治理：实行有助于发展的贸易和金融改革

18. 第 2 次全体会议由日内瓦《时代日报》记者 Ram Etwareea 先生主持。两位专题发言人，即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经社部) 助理秘书长乔莫·夸梅·孙达拉姆先生和印度经济研究与规划中心主席、经济学教授 Jayati Ghosh 女士为辩论会作了开场发言。在开始辩论之前，征求了厄瓜多尔建立新的区域金融结构技术委员会主席、即厄瓜多尔前任经济协调部长 Pedro Páez 先生和比利时欧洲债务与发展网络主任 Nuria Molina 女士对所提出的初步想法的意见。

19. 与会者讨论了现有的全球治理结构是否适当、或是否需要采取更多措施的问题。与会者指出，虽然全球经济治理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在当前的危机中，这一问题比以前重要得多。与会者说，20 国集团的成立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不过据认为，虽然 20 国集团国家已占全世界人口的 65%，但其他 35% 的人口仍然没有发言权。因此，与会者呼吁建立一个包含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在内的 192 国集团。

20. 与会者指出，现行的全球治理制度已经过时，并偏于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现行全球治理制度的基本问题自其建立以来丝毫未变。在建立该制度时，发达国家有结构性盈余，发展中国家则有赤字。与会者说，当前的形势已经有了根本的不同。资本流动发生逆转，从发展中国家流入发达国家。资金成本提高，并且出现了导致变动的新因素。与会者指出，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并没有促进发展，反而在一些经济体中造成了资产泡沫和过度投资，而冲销的高成本抵销了金融自由化的潜在好处。此外还指出，危机表明，全球不平衡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

21. 有一位发言者指出，从某些方面来说，现行制度是“金融独裁”，不允许发展中国家有贸易逆差，例如像欧元区的发达国家那样。发展中国家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以便以较高的机会成本保护自身免受资本外逃和市场波动的影响。盈余并没有被用于生产能力投资。发展中国家也不得不重新考虑本国的金融结构，这些结构注重出口导向增长，却牺牲了工资拉动和国内消费拉动的增长。这本质上是一种弄巧成拙的战略。

22. 与会者说，美国和欧洲的需求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当重新平衡其增长战略，把重点放在内部和区域需求上。发展中国家还应考虑制定旨在为其数十亿人民提供就业、体面的薪水、子女受教育机会和光明未来的增长战略。

23. 与会者一致认为，现在急需调整南北之间日益加大的能力差距，因为北方救助金融系统的资金超过了 1.5 亿美元，南方的政策能力则大大降低。与会者指出，显然需要特别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更大的政策空间，因为它们无法采取与发达国家同样的政策。这在当前的危机下尤其明显，为应对这场危机，北方采取了反周期政策，南方却往往无法采取这种政策。

24. 有些与会者认为，危机为改革全球治理制度带来了机会。改革本应遵循最初的布雷顿森林机构概念和思路，涉及发展、重建、充分就业、生产能力和非互惠原则等，而不是像实际情况那样只涉及货币和金融问题。

25. 全球经济需要更大的宏观经济协调，以减轻全球不平衡状况。在这方面，应当根据各方面——如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和联合国大会主席国际货币和金融体制改革专家委员会的提议——设立全球经济协调委员会（“施蒂格利茨委员会”）。此外，还应建立宏观经济咨询能力，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的工作不够，没有提供发展中国家所需的建议。宏观经济咨询应把发展置于决策的核心，而不是像基金组织那样狭隘地注重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

26. 与会者指出，当现有数据表明有可能恢复时，金融机构又会“一切照旧”。这造成了一种错失“布雷顿森林时刻”的情绪，即错失了实施改革政策的机会。但实际上，布雷顿森林机构精神早就丧失了，在 1971 年《布雷顿森林协定》终止时就已经丧失了。从那以来的近四十年里，资本账户的自由化以及由此引起的资金流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损害。

27. 发扬“布雷顿森林精神”需要国家之间的更大协调以及实行谨慎管制的更大政策空间；简言之，需要一个更好、更公平的金融体制。为实现这一目标，联合国应当注重五个核心问题：(a) 债务可持续性；(b) 更好的税务合作；(c) 设立一个全球经济协调理事会，以实现全球领导而不只是 20 国集团的领导；(d) 发展宏观经济咨询能力，处理各种挑战和政策优先事项；(e) 全球绿色新政，这可为适应和缓解气候变化以及生产足够的粮食提供激励。

28. 问题仍在于能否对布雷顿森林机构进行有意义的改革。无论是基金组织还是世界银行，都可根据最初的布雷顿森林理念进行改革，依据这些理念，债权人和债务人都享有恰当的代表性，否则，发展中国家应当寻求其他安排。

29. 各国政府可通过区域金融和货币举措，重新获得失去的一些政策空间。在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正在建立区域金融和货币合作框架，与会者指出，这种框架不会导致像欧元体系那样较为严格的财政和货币限制。相反，区域开发银行的三个支柱、共同货币基金和以新货币单位(并存的辅助性本国货币)为基础的区域结算清算系统可有助于国家经济免遭全球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同时使公共政策能够更好地利用资金支持当地的生产性投资举措和充分就业目标。

30. 许多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都陷入了债务困境。这一次，主权债务危机的中心不是在亚洲、非洲或拉丁美洲，而是在先进国家。国际清算银行警告说，主权债务危机已经达到“沸点”。有些经济学家也警告说，希腊的情况只是“冰山一角”，因为欧元区外一些主要发达国家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和其他指标即使不比希腊更遭，也是同希腊一样糟糕，全球金融危机正在进入另一阶段。

31. 对先进国家的债务问题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问题进行比较，就像对重量级和轻量级拳击手进行比较一样：它们的偿债能力差别巨大，债务容忍度也不可同日而语。

32. 有些发展中国家虽然受到负面影响，但“复原力”相对较强；另一些发展中国家则受到沉重打击。在世界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 2010 年 4 月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一个令人难过的玩笑是，“除债务管理者外，人人都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

33. 根据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2010 年 4 月发布的文件，在低收入国家中，有 11 个陷入了债务困境(比 2009 年多 2 个)，16 个面临着陷入债务困境的很大风险；加勒比有些较小的中等收入国家据说已处于破产边缘。该文件指出，对所有国家来说，前景同样暗淡，因为当先进经济体的财政机构开始恢复秩序、刺激政策的效果逐渐消失时，负面影响将会通过贸易、汇款和其他渠道，进一步扩散到发展中国家。

34. 发言者指出，贸发十二大曾授权秘书处提出债务和官方发展援助领域的政策建议。在 2009 年 6 月举行的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及其对发展的影响问题联合国会议上，联合国所有会员国谈判达成了一份结果文件，其中指出：**(a)** 应以暂停偿还债款作为紧急和灾难情况下的最后手段；**(b)** 应与发展伙伴一起，探讨可否为主权债务重组方面的国际合作建立一个结构更加完善的框架；**(c)** 在中间时期，应当制定一套促进负责任的主权贷款和借款的准则，以带来行为上的变化，减少草率、不负责任的贷款和借款，从而减少债务危机的发生(贸发会议 2009 年开始实施这类项目)；以及**(d)** 应当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承诺和保证。

35. 虽然粮食价格与 2008 年的高价相比有所下降，但粮食危机还在继续。粮食危机爆发两年来，由于金融危机而进一步加剧。初级商品市场的波动导致粮食价格上升了 15-20%。粮食和初级商品价格的金融化使它们成为金融投机工具，而且价格不再反映供需情况。例如，去年的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粮食价

格仍然很高。据说六大公司/组织不仅控制了粮食市场，还控制了投票者和银行等。这对全球农业治理提出了挑战。联合国应在管理和控制初级商品期货市场方面发挥作用。与会者指出，民间社会、特别是非政府组织应在全球治理改革中发挥作用。

36. 与会者还讨论了以下问题：

(a) **财政整合：**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近来提出的财政整合呼吁尚为时过早。如果过早取消财政支持，将会增加“双谷”衰退(二次衰退)的可能性。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增加的资本不应用于老式的、以条件驱动的结构方案，因为这类方案有其固有的不利于发展的效应；

(b) **创新的资金机制：**拟考虑的创新资金机制是收取金融交易税，这种机制每年可创收 1,000 亿美元，可用于为发展供资，并能遏制金融波动；

(c) **多哈发展回合谈判：**与会者指出，多哈发展回合谈判“没有取得太大进展”，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取得的进展甚至更小。总的来说，与会者认为现有多边贸易体系不太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d) **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最不发达国家必须在讨论金融问题的会议桌旁拥有一席之地。私人援助急剧下降，官方发展援助也没有达到格伦伊格尔斯首脑会议的目标。缺乏对最不发达国家的供资可能会使它们的问题更加恶化；

(e) **最不发达国家经济体的多样化：**这需要有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好的机构。国际社会应明确考虑最不发达国家的利益，并向其提供获得资金的机会，因为它们被排除在国际市场之外；

(f) **非洲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这主要与安全理事会、国际金融机构和其他全球机构的改革有关。强国想要保持现状，非洲则在力图增强自己的谈判力量。

三. 第 3 次全体会议

替代发展战略：走上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发展道路

37. 此次会议由南非援助行动国际组织国际政策与运动主任 Anne Jellema 女士主持。讨论者包括贸发会议的 Richard Kozul-Wright 先生、设在塞内加尔的西非农民和生产者组织网络主席 Mouhamady Cissokho 先生、印度最高法院专员办公室首席顾问 Biraj Patnaik 先生和印度消费者团结与信任国际协会秘书长 Pradeep Mehta 先生。

38. 与会者一致认为，接连发生的危机突出表明，需要摆脱以坚信应当放开自由市场为前提的传统思维。经济自由化及其私人化、稳定性、减少国家干预和贸

易开放等综合要素已成为发展思维的主导，并有复杂的分析框架作为支撑，认为国家干预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然而，自由化不仅没有取得预期成果，还进一步加剧了危机。假定市场本身可以高效运作，是无法实现发展的。市场可能会失灵，而且确已失灵，如最近的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所表明的那样。

39. 与会者指出，富裕国家的经济增长历来都非源于不受限制的国际自由贸易，而是源于认真拟订的工业化政策，这些政策逐渐形成了特定的经济结构。国家在支持工业化进程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类政策产生的能动协同作用实现了提高经济体的生产能力和推进社会议程的双重目的。

40. 提高生产能力的出发点应是确定在人力资源和所需的基本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具有强大市场潜力的部门。不改革国际结构，将很难实施替代发展战略，而改革面临的挑战除其他外包括重新确立国际公共货物的概念。为了应对超出国家界限的各种相互关联的挑战，需要实行“全球新政”。只有国际经济结构有了重大改变，才能带来更加公正、民主和更具包容性的世界秩序。

41. 积极主动的政策、特别是旨在创造工业能力的政策，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需要通过以公共投资为重点的大规模投资来“大力推动”发展，并需采取综合全面的一揽子政策，通盘解决发展制约因素。此外，发展议程还应把重点转向包容性更强的国家战略，以减少国内的不平等现象。可通过实施渐进性的税收计划和扩大福利范围来实现这一目标。这种积极的办法要求在国际一级制定不限制国内“政策空间”的有利框架。“政策一致性”问题也很突出；各部门各级采取的政策应当相互加强。

42. 与会者详细讨论了妨碍发展中国家实施替代发展战略的结构性限制。有人提请注意“资金大量缺乏”的问题，特别是在最不发达国家。面对援助流入停滞、债务负担加重、税务基础范围缩小、价格和汇率变动等情况，急需调动新的国内和国际发展资源。与会者提出的一些创新工具包括：混合计划，如混合使用赠款和贷款工具；特许权，包括建设—经营—转让方案；债务换股权和债务换环境；通过预算支持和对部门政策的支持等方法，将援助与国内工业政策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及增加中小企业获得信贷的机会，包括加强银行的风险评估。

43. 有些发言者强调，必须更多地把重点放在清洁增长极上，认为这些增长极能够实现支持工业化和解决气候变化相关挑战的双重目的。发言者指出，《2009/2010 年贸易和环境回顾》建议发展中国家侧重于三个充满希望的领域：**(a)** 能源效率；**(b)** 包括有机农业在内的可持续农业；以及**(c)** 可再生能源技术。这些领域可产生积极的外溢效应，但要得到实施，还需采取经济激励措施，取消不正当的激励措施，并需要领导和政治承诺，以及人员、企业和技术能力。但发言者还认识到，可能需要在环境可持续性和消除贫困之间进行取舍。

44. 与会者特别关注机构和治理问题，在这方面，可从国家一级的创新做法中吸取重要教训。许多发言者提到对公民及其日常问题漠不关心的不大情愿的政府。出现这种情况的关键在于，政府依赖援助，因此必须对西方捐助者和布雷顿

森林机构负责。监测和评估制度由捐助者设计，公民全然不知官方发展援助用于何处，取得了什么成果。非洲的一些与会者强烈提出了问责制问题，指出决策者没有采取响应当地需要的政策，特别是在粮食安全方面。与会者认识到，需要通过加强多方利害关系方对决策和政策落实监测工作的参与，重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信任。

45. 粮食安全问题十分突出。虽然土地、水和人力资源都很丰富，但饥荒仍然威胁着很大一部分人口的生命。有些民间社会组织自行承担了向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采取行动的责任，提出了食物权问题。印度的情况就是如此，在该国，食物权被规定为一项法定权利，可由法院强制执行。自那以来，该国为确保食物权进行了大量投资，预算总额达 100 多亿美元，并实施了一项有 2,000 多个民间社会组织参与的综合方案。

46. 关于非洲，与会者强调，最近发生的粮食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出口型发展战略的遗留问题和农村地区长期投资不足。在出口型发展战略下，从生产符合当地需要的主粮转向了出口经济作物。现在需要重新把重点放在主粮生产和粮食的自给自足上，但这样会使当前的贸易谈判不再涉及粮食安全相关政策。有发言者还请注意公共部门采购举措。农业发展对于改善粮食安全状况、启动工业化进程和建立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信任关系非常重要。

47. 有些发言者对“替代发展战略”的概念持有异议，指出这只会将辩论局限于是由国家主导还是由市场主导。重点应放在制订“务实的政策”上，允许更多地注重“试验”。还有一些人强调转而采取基于人权的发展办法，以此抓住互相竞争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问题之间的相互联系。

48. 需要处理的问题很多，必须分出先后顺序和轻重缓急。有与会者强烈认为应以粮食安全和粮食的自给自足作为优先事项，因为这是人的尊严和身份问题，比什么都重要。有效的粮食安全政策还可有助于恢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最后，与会者指出，如果让人民参与决策，这一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一旦调动了人民，就能根据他们的需要，确定问题的轻重缓急。

四. 第 4 次全体会议

闭幕

49. 闭幕全体会议由贸发会议贸易和发展理事会主席让·费代尔先生主持。

“实现权利：伦理全球化倡议”主席即前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玛丽·鲁宾逊女士作了主旨发言。致完闭幕词后，贸发会议最不发达国家问题特别顾问德巴普里亚·巴塔查里亚先生总结了研讨会的讨论情况。让·费代尔先生和贸发会议副秘书长佩特科·德拉加诺夫先生作了结论性发言。

50. 鲁宾逊女士在发言中首先指出，过去的 12 个月里，全球贸易急剧下滑，世界处于大萧条的边缘。她说，虽然目前经济正在微弱复苏，但“处于这些危机中心的人们”仍然得不到重视。许多国家在解决长期存在的不平等和社会排斥问题方面没有取得进展，这意味着最弱势的人群仍将继续面临贫困，许多国家将无法到 2015 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因此，必须找到让各国政府履行在《千年发展目标》、《援助时效巴黎宣言》和《阿克拉行动议程》中所作承诺的办法。

51. 鲁宾逊女士强调，需要审查应对全球经济动荡、缺乏粮食安全和气候变化等问题的发展政策。应把重点更多地放在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上，并应解决不平等问题，结束歧视和排斥，加强所有利害关系方对发展决策的有意义的参与。鲁宾逊女士指出，贸易和投资政策必须反映增强穷人能力的方针，并指出，促进穷人法律权益委员会的工作指明了通过四个支柱实现穷人权益的途径，这些支柱是：诉诸司法权、劳动权、土地权和经营权。

52. 鲁宾逊女士提请注意妇女和女童对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非正式部门中妇女的重要性。赋予妇女机构在发展问题上的发言权是在所有《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实现突破的关键因素。但歧视妇女的例子太多了。很多国家的社会对妇女不够重视，虽然妇女是推动社会发生有益变化的力量。鲁宾逊女士指出，积极的变化可确保妇女和女童权利得到社会的保护。

53. 鲁宾逊女士强调，问责制对于实现发展目标非常重要。发达国家必须履行援助承诺，政府应负责在预算的编制和花费上支持发展优先事项。要求所有政府负责意味着为支持农业认捐的 200 亿美元将得到兑现，对非洲进行的外国投资将真正改善个人和家庭的生活条件。除投资以外，强调促进法治的政策对于发展也很关键，因为从投资角度看，法治至关重要。

54. 共担责任概念也是全球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这一概念承认，各国需要共同承担责任，特别是在贸易和气候变化领域。将气候与经济改革议程联系起来并非易事。但应从许多成功案例中吸取经验，在这些例子中，当地经济增长的基础是可持续的农业和林业，以及利用低碳技术增加家庭和工业用能源的供应。电的使用可以说是尚未实现的《千年发展目标》之一，因为全世界有 16 亿人用不上电。

55. 问责、参与、不歧视和透明等人权原则是以人为本的持久发展的基石。最后一次全体会议的讨论重点包括：需要创造就业机会；各国需要实现粮食主权；以及需要处理优先考虑消费者而非生产者的不公平的贸易政策等。会上强调了区分经济危机和粮食危机的重要性。与会者指出，贸发会议显然对粮食和农业生产有了新的、而且更加强烈的兴趣，从而可以解决粮食安全和食物权这一严重问题。

56. 研讨会强调，必须在发展议程和基于权利的办法之间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以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各项政策应优先考虑工作权，而不是只把重点放在遏制通货膨胀的必要性上。大规模的资本流动投机是造成脆弱性的驱动因素，应当

加以管制，而从实体经济角度看，应当提高生产能力。可以增加供资，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巨大需要，从而创造就业和财富，并带来新的贸易前景。即使在实施了旨在积极推动就业的贸易自由化政策之后，创造就业机会仍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

57. 闭幕全体会议针对会议的两项主要内容，即全球危机和新的发展道路，对研讨会作了总结。会上指出，危机还远未结束，虽然其长期影响尚且未知，但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研讨会指出，这些后果包括：《千年发展目标》无法实现；官方发展援助流入量下降；银行为生产部门提供的贷款减少；粮食危机将会继续；初级商品价格将再次波动；汇款受影响的程度降低；保护主义趋势增强；在全球变暖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等等。关于对策，研讨会强调，应当赋予 192 国集团在遏制危机方面的发言权。研讨会感到遗憾的是，没有对全球经济治理实行任何改革，联合国作为举行全球治理辩论的最具代表性的机构，却成了旁观者。与会者在关于如何改革治理制度的讨论中，强调了积极的民间社会、特别是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58. 研讨会发出的最有力的信息包括：传统发展模式已不足以确保稳定和增长，必须采取以深入改革为基础的其他途径。会上强调了联合国作为最主要的多边平台的重要性，但民间社会也应发挥重大作用。

59. 这条新的发展道路的要素可包括：一个有利的宏观经济框架；侧重于帮助生产者实现生活保障的农业政策；促进以收入为基础的加工活动；有效利用公私伙伴关系的基础设施建设；利用清洁技术的可持续增长；普遍的社会保护；以及加强南南合作等。另外，为了处理全球经济治理问题，研讨会还建议增强多边体系的有效性和包容性，改变国际金融结构，促进国际税务合作。此外还强调，应当协调汇率管理，将生产能力建设和基于权利的问题纳入《千年发展目标》，并应建立一致的气候变化结构。